论海特姆/梅森之互文性翻译观

纪玉华， 杨士焯
（厦门大学 英文系，厦门 361005）

摘要：海特姆和梅森建构的互文性翻译理论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互文性在语篇里的功用，帮助译者识别互文链，并在翻译过程中对互文指涉的转换作出调整。但该理论未谈及译文进入目标语文化系统后因调整的关系而导致目标语原有文化词语的互文渗透这个问题，在此略作补充。

关键词：互文性；互文链；互文指涉；调整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1)03-0184-05

On Hatim and Mason's Intertextual Translation Theory

Ji Yuhua, Yang Shizhuo
(*Department of Englis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From a text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Hatim and Mason's intertextual translation theory analyses the function of intertextuality in texts, aiming at enabling the translator to identify intertextual chains and to mediate the transfers of intertextual references. Unfortunately, their theory does not touch upon the issue of intertextual infiltr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cultural expressions into the translation due to such mediation. An attempt is made to make up for this drawback.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intertextual chain*; *intertextual reference*; *mediation*

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如柯斯蒂瓦(Kristeva)[1]、巴特(Barthes)[2]等认为，由于语言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人类来说，世界就是无穷无尽的文本。该理论把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这些理论家以互文性理论为武器，打破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在他们的理论中，文本作者的作用大大衰减，作者的主体性及其对文本的权威性消失了，其作用降至仅仅为不同文本间的相互游戏(interplay)提供场所或空间。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从而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都互为文本。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3]。文本的英文对应词是text。text这个术语在文论中一般译成“文本”[3]，故intertexuality译成“互文性”。然而在语篇语言学研究中，text一般都译成“语篇”[4–5]，这样intertexua- lity似应译成“互语篇性”。鉴于“互文性”已约定俗成，本文采用此译法，但在讨论text例证时仍使用“语篇”。

在给语篇下定义时，柯斯蒂瓦(Kristeva) 强调这么一个过程，即通过它，语篇可追溯到前面的语篇，给其意识形态上中立的形式增加全部的潜在意义容

收稿日期：2011-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8BYY072)；福建省社科规划资助项目(2008B058)
作者简介：纪玉华(1959-)，男，教授。**研究方向：**批评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口笔译研究、英语教学法。
E-mail: yuhuaji@xmu.edu.cn

量。这些意义是从经历、意识等积累而成的。总起来说，这就是互文性的功能。柯斯蒂瓦使用“互文性”这一概念来表示以前文的存在作为能指行为的前提(先决条件)，但几乎没考虑到已有语篇的语义内容，例如，看似简单的指涉“the token female”(象征性的女性，某组织或机构推举的女代表以示无性别歧视)、“the fall guy”(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替罪羊)需要的不只是提供语义内容知识，人们需要了解一系列构成西方文化中这些信仰体系的话语或语篇，即他们的背景知识[1]。

韩礼德从语篇角度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语篇有互文性，也就是说，语篇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除了与情景因素和文化因素相关外，还与其他语篇有着一定的联系[6]。韩礼德列举了语篇互文性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发生在与之正在研究的语篇为同体但更大的语篇之中，如小说中的某一章节与其他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二种发生在与之正在研究的语篇同类型的几个语篇之间，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战地钟声》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发生在与之正在研究的语篇不属同一类型的语篇之间，如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与《哈姆雷特》的评论文章之间的关系。韩礼德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对如何将文学语篇分析置于较大的语言交际背景中来考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7]。贝尔(Bell)[8]将互文性看作是构建语篇的 7 个标准之一(其余 6 个标准分别是衔接、连贯、意图性、接受性、信息性和关联性)。英国翻译理论家海特姆与梅森(Hatim & Mason，以下简称海/梅)将互文性理论引入语篇翻译研究中，在《语篇与译者》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的关系[9]。由此，互文性经历了“文学研究→语篇语言学研究→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

一、海/梅之互文性语篇分析模式

英国翻译理论家海/梅将互文性理论引入语篇翻译研究中，其主要意义在于从语篇语言学的技术角度仔细分析主语篇里的互文性关系，帮助译者更深刻地理解和分析原文，并在翻译过程中据此对译文作出全面调整。海特姆认为，互文性在具体的实践中，如笔译和口译，为基本的符号概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检验场所。这是应用中的“符号学”[9]。海/梅的互文性特色体现在他们运用了详尽的互文显示方法——互文链。通过互文链人们能够对具体语篇做技术性分析。首先来看一段文字(为如实反映海/梅的理论依据，部分例子引自原书[9])：

语篇 1

Terrorism was to become the keyword

Not everyone feels immediately threatened by the Red Army, but every citizen gets on an aero plane one day.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choice of “terrorism” as the psychological theme was very carefully worked out. (After all, it has 57 varieties.)

译文　恐怖主义将成为关键词

不是每个人都马上感受到赤军的威胁，但每个公民都有坐飞机的一天。有种种理由认为，把“恐怖主义”选作心理研究主题是精心设计的。(毕竟，恐怖主义共有 57 种)

为了看懂上述语篇，语篇接受者必须从“不确切的”语言外涵义(即使用)跨越到构成使用基础的“意义”流。把一连串互文指涉拼合在一起，识别出其线索，从后来篇章中遇到的信号追溯到先前信号，并追溯到被唤起的整个知识领域。在语篇 1 中，57 varieties(57 种)就是一个指涉到先前语篇“Heinz 57”(亨氏 57)的互文词。语篇 2 正是它的先前语篇。

语篇 2

No mistake: this is Reagan’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IN THE MOVIE version of Richard Condon’s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poor sap who plays the Joe McCarthy figure gets all confused. One day he has to say there are 50 communis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ext day his handlers order him to name 75. He fears that he may attract ridicule. “You dummy,” says his ambitious wife, at breakfast, “don’t you realise? People aren’t asking whether there are communis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y more. They’re asking *how many* communists there are.”　At this point, the husband’s glassy eye falls on a bottle of Heinz ketchup. Cut to the next scene, where he solemnly announces that there are 57 enemies of the state holed up at Foggy Bottom…

(a few paragraphs later)

The chief ingredients of [Reagan’s] doctrines can be, for convenience, numbered and placed in body bags:

1) Anti–communist subversion would no longer…

2) Alliance with existing governments would be…

3) The opinion of the press, of public opinion and…

4) Terrorism was to become the keyword. Not everyone feels immediately threatened by the Red Army, but every citizen gets on an aeroplane one day.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choice of ‘terrorism’ as the psychological theme was very carefully worked out.（After all, it has 57 varieties.）

译文　没错：这正是里根的外交政策

华盛顿

在根据里查德·孔东小说《满州候选人》[①] 拍摄的影片里，那个扮演乔·麦卡锡[②] 角色的可怜家伙给搅晕了。今天他说国务院里有 50 个共产党人，明天他的上司又叫他说有 75 个。他担心人家会说他荒谬。“你这蠢货”，他那好强的妻子在吃早餐时骂道，“你还不明白吗？人家才不问国务院有没有共产党人呢。他们问的是有多少共产党人”。这时，丈夫那双呆滞的眼珠落在一瓶亨氏蕃茄酱上。镜头切到下一个场面，只见他郑重地宣布有 57 个敌人躲藏在国务院里……

（几个段落之后）

［里根］学说的主要成分，为方便起见，可以标上号码装进运尸袋里：

1) 反共颠覆将不再……

2) 与现行政府的联盟将……

3) 报纸意见、公众意见和……

4) 恐怖主义将成为关键词。不是每个人都马上感受到赤军的威胁，但每个公民都有坐飞机的一天。有种种理由认为，把“恐怖主义”选作心理研究主题是精心设计的。（毕竟，它共有 57 种）

从语篇 2 中看到，这其中的互文链是：terrorism’s 57 varieties（恐怖主义的 57 种）→solemn announcement: “57 enemies of the state”（庄严宣布：国家的 57 个敌人）→Heinz 57 varieties（亨氏 57 种）→75 communists, 50 communists, etc.（75 个共产党人、50 个共产党人，等等→Joe McCarthy figure（乔·麦卡锡角色）→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etc.

这个互文链可通过图 1 表现出来。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其中的互文关系：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来源于一种妄想症、胡编滥造。它随意捏造共产党人的数目居然依据一种亨氏 57 种蕃茄酱，而里根主义恰恰就是这种妄想症、随意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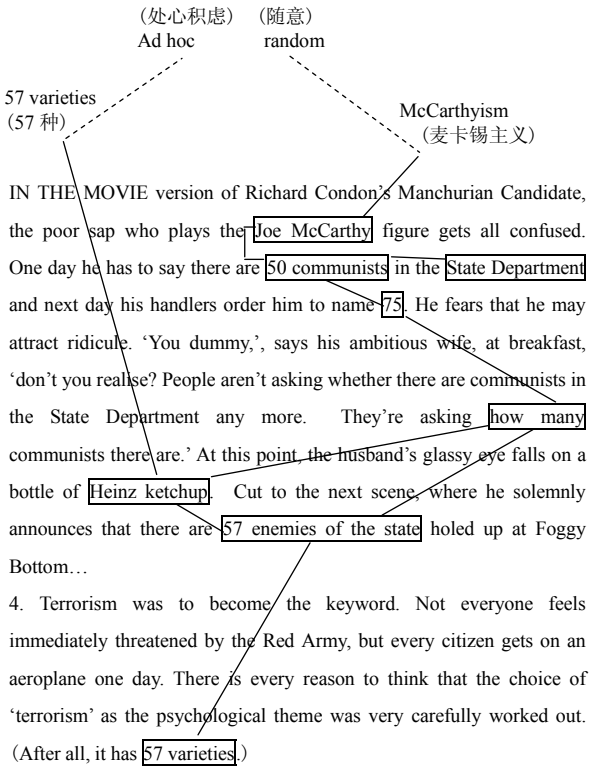

图 1　语篇 2 中的互文链

Fig.1　Intertextual chains in Text 2

敌的反映。因此，成功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特别是一些非西方社会的语言，了解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互文性是翻译的第一步。

二、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

从上述互文链中可看到，互文性不是语篇的某种静态性。在翻译中它不等于单纯一对一以译文指涉取代源文指涉。相反，互文性通过意义的符号体系来看最清楚。在前面语篇中，作者把恐怖主义和 McCarthy’s ad hoc-cery（麦卡锡的处心积虑）与 Heinz 57 varieties（亨氏 57 种蕃茄酱）联系在一起。为了达到作者的目的，即把里根总统对待恐怖主义的方法视为随意性的，读者就要了解前文知识。

在这个情况里，互文链是有力的，它意味着能在语篇本身之外激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但互文功能并非永远那样积极。互文性的消极形式最多不过是要求语篇要有内在连贯（使易懂）。这种消极互文线索的例子就是语篇 2 中的 poor sap→confused→dummy→glassy eye（可怜家伙→搅晕→蠢货→呆滞的眼珠）互文链，它用来建立意义连续性。意识到这些环节使译者能确保相似的网络得以尽可能地在译文中反映出。换言之，这些是在语篇内部解决问题。消极互文性就是指在已有一语篇里各因素之间存在

① 指经过某组织或外国洗脑后一味服从其命令的人，根据美国作家 Richard Condon同名小说改编。

② 乔·麦卡锡（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20 世纪 50 年代初煽动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

着关系，亦称内互文性。例如，重提十分钟前谈过的观点，或者一种指涉在几个段落之后再提及。上述讨论的语篇 2 就是指的内互文性。

巴特扩展了互文条件，将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都包括进去，从而超越了“语言符号”的中性意义[2]。正如巴特提出，当文化内涵义和知识结构结合而成一个互文指涉时，互文性就更是一种挑战。在这个广泛定义上讲，互文性起一个积极作用，它表明：语篇对某个作者来说，从来不是原创或特定的。他们总是依赖先前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是清晰可辨的语篇，也是决定整个体裁的适应性的普通条件。这个意义上的互文性能够把一个语篇置于相关符号和规范体系内。它采用的也许是语篇的模拟、抄袭、模仿、引证、驳斥或变化等形式[7]124。用柯斯蒂瓦的话说，“每个语篇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每个语篇都是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化”[1]146。在许多情况下，英语在使用表达语时会作一些巧妙的转换，如A Tale of Two Hearts（一则关于心脏移植的新闻报道的标题）套用狄根斯的名著*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Liberty is the true mother of invention套用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需要是发明之母）等[10]。

三、调 整

博格朗（Beaugrande）和德雷斯勒（Dressler）采用大调整或小调整来表示互文指涉的消极—积极程度。调整（mediation）是指“人们把自己当前的信仰和目的输入到交际情景模式里的程度”[11]。

在用到与当前语篇的运作相关的其他语篇的知识时，肯定会出现这种调整。如果当前语篇和先前语篇之间的距离很大（有诸多因素，如时间的流逝），那么所做的调整就更大。调整对著名的语篇来说，在出现引文或指涉的情况下是较小的。在一些活动如回答、拒绝或评估对话中的其他语篇时，细微的调整还是需要的。

审视译者在涉及互文指涉的转换时如何决策，调整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例如，在翻译莎士比亚引文时所涉及到的调整达到什么程度？虽然可以假设时间的遥远是主要因素，还有其他考虑会影响所需的调整程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只需对引文作出细微调整，而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则会作出大调整。毋庸置疑，这在英汉翻译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大调整或小调整除因文化背景的不同之外，还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关系密切。比如，在Theodore Savory 的《翻译艺术》中曾引用罗塞蒂的一段话：

从事翻译，译者就要有所克制。倘若他能随心所欲，就常常会发挥译文的优势，表现他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要不是碍于原作者限制了结构，他就会在译文里加进一些特有的节奏；要不是碍于原作者限制了节奏，他就会在译文里加进一些特有的结构。他时而为了追求声音和谐悦耳而忽视内容，时而为了保留内容而忽视声音和谐悦耳。但是这两种做法都不行。他必须二者兼顾，一视同仁。有时，作品有点瑕疵，搅得译者心烦意乱，恨不得除之为快，诗人当时没改掉，他要帮着改。但不行啊，“契约上没有规定”[12]。

上面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巧妙地引用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说的话，表示和商人安东尼签定的那份契约中没有做割肉不准流血的规定。英语原文中的引语 It is not in the bond 并没有以引号或注释加以解释提醒，幸运的是中文译者正好了解这一背景，并以翻译加脚注的方式传递这一隐喻。这也是一种调整的策略。

四、非互文性

语篇不仅仅是从其他语篇采集而来的“点点滴滴”的拼缀品。互文性也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包含对另一语篇的偶然引用。相反，引文、指涉等将会以某种原因带入语篇。这个互文关系的动机本质可通过语篇功能或整体交际目的等事物加以解释。比如，人们使用莎士比亚话语是出于修辞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肯定会产生新的价值。下面一段新闻英语（摘自英国 Sunday Times，1983 年 11 月 13 日）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句。

语篇 3

Sir Terence Beckett, who as Director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might be expected to know, has called our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shabby and expensive”.

译文　特伦斯·贝克特爵士，身为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本来我们指望他该知道，却把我们这颗镶嵌在银海上的宝石称为“简陋又奢侈的”。

此处的引文并非仅仅是意在借用一权威词语到一篇根据某观点写成的文章中。这里，引文…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从一个能指系统传到另一个。该词语引自莎剧《理查德二世》（第二幕第

一场）中，它喻指英国，隐含和爱国主义有关的价值。但在上述新闻语篇中，在对“those who might be expected to know”（那些大家可以指望他该知道的）话语上，它增加了讽刺意义。它表达的是英国有识之士对昔日光辉灿烂的英国如今道德败坏、国势衰微的哀叹。作者使用了这样的反义词如 expensive（奢侈）对 precious（有价值）；shabby（破败）对 stone set in…silver（镶嵌在银海上的宝石），以此形成对比。

因此，引文的互文过程，不是简单的思想联想问题，即主观和任意的。相反，它是一个能指系统，靠内涵义来运作。它需要一种社会知识使其能有效地作为意义表达的工具。引文的每次侵入语篇就是一个过程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从一语篇（源语篇）向另一语篇（目的语篇）移动。从一语篇向另一语篇跨越我们称之为互文空间[9]129。正是在这空间，附加在符号上的成套价值被更改。就是说，引文的源语篇的符号价值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就得经过转化。

五、互文性类型与互文连贯

一般说来，互文性类型的区分是非常广泛的，它其实是对以往习以为常的文字表达技法的整合识别。互文性类型的定义就是“语篇和那些先于它、激发它、使它成为可能的前语篇所维持的关系”[9]132。如此，则互文语篇属于下列类型之一。

（1）索引，通过指示标题、章节等揭示来源。例如，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引用了 John Donne 的诗歌 No Man Is An Island（没人是座孤岛），蕴含了小说所要表达的玄学色彩。

（2）陈词滥调，一种由于滥用而几乎没意义的老一套用语。例如，“名落孙山”、“东床坦腹”等。

（3）文学典故、著名著作的引文。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最有名的如《红楼梦》里宝玉和林黛玉引用《西厢记》里的词语互相调侃、薛宝钗用“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的艺术性讥讽。

（4）引用自己的文字。例如，对自己先前论点的强调。

（5）习惯语，由于重复使用导致来源不详。

（6）成语，即让大众容易记诵的谚语。

（7）调整，即将自己对一语篇效果的阐释经历付诸文字。

这些种类为之提供了区分互文指示的广泛体系。这些关系只有通过符号相互作用来实现。从前语篇（即源语篇）到主语篇的互文链一旦进入翻译状态，就扩展到目标语语篇，互文指涉被译进这个译文语篇内，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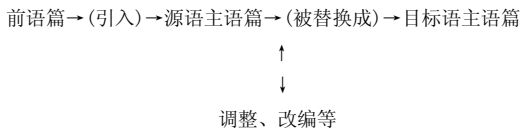

图 2 互文链

Fig.2 Intertextual chain

这种从源语主语篇到目标语主语篇的跨越，期间虽然经历了调整和改编，但仍是保持一脉相承的关系。弗美尔（Vermeer）从功能翻译论（目的论）的角度，将其称为“互文连贯”[13]31，因为一篇译文是前信息文的信息文（offer of information），它带有与相应源语篇的某种关系。互文连贯应存在于源语篇和目标语篇之间，它采用的形式要看译者对源语篇的阐释和翻译目的。互文连贯的最大连贯就是忠实模仿源语篇。对目的论来说，互文连贯被看作从属于文内连贯，而二者又都从属于目的原则。如果目的要求起功能变化，那标准将不再是和源语篇保持互文连贯，而是关系到目的的充足或适当与否。如果目的是要求凸现文内非连贯（如荒诞剧），那么文内连贯的标准不再有效。这恰恰印证了语篇建构的另一特征，即意图性（intentionality）。意图性通常在层次上高于信息内容，正在于它是一个已知指涉的一般符号描述的基础。实际上被转换过去的这个符号，在越过符号范围时，已带有其整个分离记录（包括它在半途收集到的新的符号价值）。鉴于不同的语篇使用者带着不同的知识和信仰体系进行语篇阅读，译者也会依据意图性的优先秩序作出调整。这些正是译者决策背后的问题。例如，译者在翻译语篇 2 时就保留了意图性，使源语篇中讥讽某人决策的随意性行为得到揭示。

六、目标语文化互文性在译文里的渗透

正如前面所叙，互文性不能单纯地表现为“引申”到其他语篇，它已被看作是所有语篇的重要条件。作为语篇的使用者，都认识并参与到这种相互作用中去。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是语篇之间的，也是一能指系统与另一能指系统之间的，二者同在一相同的语言里，以及语言之间：互文指涉的基本点是通过前语篇对主语篇的贡献来加以分析。在从源语篇行进到主语篇，互文信号经历了意义符号的实质

（下转第 238 页）